

# 鲁迅是我永远的老师

陈应松

我经历过不下十几次搬家，从故乡小镇搬到县城，又从县城搬到省城，在武汉三镇辗转租房，搬去搬来，但我的书柜里没有失散的书就是我40多年前在家乡公社的供销社购买的鲁迅的书，也有在县城和沙市等新华书店买的。这套鲁迅的文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，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一直出到打倒“四人帮”的80年代初。这套书最便宜的是《野草》，两角，最贵的是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0.64元，每一本都有我购买时的签名和落款时间。有的书如《热风》，我竟然在每篇的后面写了一段几百字的读后感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像幼稚，但在那个年月思考的问题却是高大上的，是与“文革”时的流行语言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。这也证明，我比同龄人早熟，有鲁迅先生作品的指点和加持。与伟大的思想者站在一起，一定会有思想。

那时我非常穷，多用了两毛钱就得挨饿一天，在学校住读，一周的菜金是一块钱。为了买下新到的鲁迅书，我又是捡破烂，又是做小工。这套书虽经历了四十多年，已经被我翻得面目全非，有几本还遭受了老鼠的啃咬，残缺不堪，但依然是我书柜中的最爱之一。我特别喜欢的是《野草》，这书中的每一篇我都喜欢，虽然短小，但耐读，诗一样的片断。《彷徨》《呐喊》《故事新编》我也喜欢。但我也发现，我还新发现的《两地书》等，当年我的同学借去就没还给我，散失了几本。我曾经模仿《野草》，写过许多日记，这是我最初走上写作之路时的练笔，但也锻炼了我的语言基本功。《野草》里面的短章如《秋夜》《影的告别》《求乞者》《好的故事》《过客》《死火》《失掉的好地狱》《墓碣文》《颓败线的颤动》《死后》《这样的战士》《聪明人和傻子》和《奴才》，有的就是片断，但意境特别，妙不可言，语言的组合精粹、凝重、深厚、孤绝。鲁迅的小说其实也是这样，像《故事新编》——有的篇章现在看来像是穿越小说——中的《补天》《铸剑》等，写悲壮的、末路的灵魂和英雄。他作品中萦绕的英雄气质同样也是迷人的，让年轻时的我们异常向往。在没有书读的年代，因为意外地有鲁迅的书可读，挽救了一代人对汉语的热爱，浇灌了一代人的精神渴求，也矫正了一代人精神发育的畸形，同时暗暗地塑造了一代人的气质。这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巨大的胜利。

我曾经在访谈中说过，中国作家，我唯一受到影响的是鲁迅，他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，包括思想和语言。思想即在写作中往大处思考，不局限于个人的悲欢离合，恩怨恩怨。语言包括说话的姿态、语气、语言性格的方式。在说话上模仿鲁迅的性格和作派。他作品中的先锋姿态特别吸引我，他表现出的孤傲、孤僻、孤愤、孤愤、孤愤，特别是语言的孤峭，格外迷人，许多作家在这一点上受他的影响最大，通过对他作品语言的模仿，来塑造一个自己，让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形象，这个形象就是孤峭。性格的孤峭和语言的孤峭，有着叛逆、不屈、刻薄、幽默、自嘲甚至恶毒的力量。我说他的力量是正面进攻的力量，还有一种在结束之后的反噬的力量，这是非常神奇，令人难以理解。我那时也看了一些三四十年代作家的作品，鲁迅的面目与他们完全不同，可说是天壤之别。三四十年代的作家，小资情调严重，许多人干的是鸡汤写作，鲁迅干的却是残酷写真的活，是壕堑里白刃格斗的活。何况鲁迅人格的真，人性的真，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作家可比拟的。他的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”的心境，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流露出来，一个如此深刻洞悉和剖析了中国人劣根性、中华民族的沉疴痼疾的伟人，在麻木时代呐喊的战士，也有

这样彷徨的时刻，我们看到他的孤独和彷徨，也就看到了作家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。袒露内心的作家，内心一定强大。

乡土小说在中国白话小说的百年传统里，历来有牧歌和启蒙两派，只有鲁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族启蒙者，而且他是孤军作战。只因他的精神体量巨大，以一当百，成了乡土写作难以逾越的高峰。他写出的祥林嫂、阿Q、闰土、老栓、豆腐西施等人物是真正中国人的形象，有着无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其他左翼作家所谓的典型人物，有的是假设性的人物，有的是因概念而生的人物，因此没有持久的生命力和繁殖力。

因为鲁迅小说的绝对先锋气质（精神/思想的先锋和艺术/写作手法的先锋），是我一开始写作就模仿的对象，后来我的语言风格的形成，完全看得到鲁迅的影子，叛逆、幽默、反讽、孤愤、幽暗中的挣扎和绝望里的抗争，这些异质的、异类的元素，一直激励和控制着我的写作。文学是应该揪心的，鲁迅作品中弥漫着的揪心感，像石头隆隆地行走在天空，给读者以重压，这正是启蒙者应有的分量 and 标配。后来我的神农架系列小说，如《马嘶岭血案》《太平狗》《狂犬事件》《一个人的遭遇》等等，就是在鲁迅的深刻影响下出现的。

我们从鲁迅先生的孤军奋战中，得到一个教训，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启蒙力量太薄弱，当代虽然有韩少功、张承志等人的努力，但牧歌式的写作力量太庞大，启蒙是一个奢侈的愿望，是一种历史的幻想。我们文学的思想能力太差，导致文学的技术性也太差，包括干巴巴无趣的语言、轻佻虚假的人物、圆滑世故的构思，为了不让外界找茬，文字（语言）的逻辑性太强，步步为营、步步设防，甚至不知道像突兀、断裂、停顿、回旋等句子的超验妙处，这正是我们作家精神倦怠和投机的写照。如果有犀利的思想，就一定有犀利的构思和文笔，有犀利的人物和语言。反之亦然。

可惜，当代文学的人物群像中，很少看到鲁迅式的表达，少有经典之作。

鲁迅的影响为什么历久弥新？他的能量为什么能俘获当代的中国作家？是因为鲁迅一直没走，一直在陪伴着我们，引领着我们。我们的精神营养中，离不开鲁迅，没有他，我们将永远在暗夜中。

陶校长，第一次遇到你时，你对我说“在上师大学习同样能成才”，我一直牢记在心，我可以无愧地说，我在上师大的十年是努力奋发的十年，没有辜负你的厚望。从事教学工作八年以来，我一直以你为榜样，将教书育人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职责，尽己所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贡献，没有让你失望！

从两年前出版的纪念文集《师长·社长·校长——我印象中的陶本一先生》，我了解了更多关于陶校长的事情，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。现在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，遇到问题时，再到六教四楼的那间办公室聆听教诲，但是，借助你之前的亲切指教，我相信一定能找到我需要的答案……



“文汇报”微信二维码

# 这也是我们的复旦叙事

《相辉——一个人的复旦叙事》读后

章洁思



《相辉》（读史老著，2020年4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）

逐字逐句读完了《相辉》，心里满满的。满满的人、事，充塞心头：过去和现在，见过和未见过，熟悉和不熟悉，听说和未听说过……还有那些复旦的建筑，三村四庄、南轩、奕住堂、登辉堂，燕园的小桥流水，空中回响着大声读外语的声音，周边那些窄窄的小河，河边在煤屑地跳跃奔跑的孩子们，这其中就有我……唉，无穷的回忆，在眼前穿梭。

在复旦，我，除去生命最初两年在重庆北碚时没有记忆的年月，在上海也有三段岁月。第一段，是五六岁时在国权路小学读书，那时住在庐山村。我们住十号，开门就是一座防空洞的小山包。这座小山包是我童年快乐的陪伴。拉着两边的草，三步两步就爬上了山顶，坐在蒲公英和不知名的野花中间，手里捧着一袋刚刚爆好的爆米花。从山顶望下去，还有来来往往的邻居，只要看见父亲的身影，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蹿下山去。

这个防空洞父亲带我躲过几次轰炸。那时虽然已经解放，但时还是有警报拉响。记得最清楚的就是1950年杨树浦发电厂被炸，因为离得近，轰炸声很大。当时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我挨着父亲，第二天才知道我同桌的爸爸被炸死了。那次印象很深，因为当时，我实在不能想象没有父亲的家会怎样。

那时，我们的班主任是杨老师，她带着女儿住在校内，她的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，我曾跟着同学到她校内的宿舍玩过。她很慈祥，脸部皮肤上的汗毛很密。她经常给我们讲故事，比如格林童话，还有许多民间传说，几乎每堂课都讲，许多故事从她的嘴里流到我们心里，构成美妙的联想。因为这些故事，也因为她的和蔼，我们都特别喜欢她。

庐山村的后面是复旦农场，一天，小伙伴告知，农场要求大家去掰茭白。她约我同去。我从未去过农场，也不知茭白怎么掰，晚上，就跟着去了。一到那里，只见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许多人赤脚下到水里，他们手中拿着掰下的茭白，兴高采烈。我犹豫了半天，还是不敢赤脚下水，就蹲在一边看。回来时，同去的伙伴送我两支茭白，总算没有空手而归。

不久，便是抗美援朝战争。大学校园一股争先恐后的火热的氛围，扩音喇叭从早到晚播送着“再见吧妈妈”的苏联歌曲，这首歌伴随着我一路上学。一天，我戴着学校奖励我的大红花回家，在国权路上遇到常来家里玩的父亲的学生，她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，父亲正在登辉堂（现在叫相辉堂）前的草坪上和学生们一起照相呢。后来在父亲相册中见到这张照片，父亲的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多么温暖的笑容。

第二段岁月，随着父亲在沪江大学的工作结束，我又回到了复旦，又回到杨老师的班上。

这时父亲还没来得及跟我们一起搬家，就已经离沪，投身到赴朝鲜慰问的工

作中去。我和母亲被安排住进与庐山村对门的徐汇村，我们住八号，右边倒数第二排的第二家。徐汇村全是平房，布局非常规则，方方正正的，我们住在大大（方令孺）家的同一排，只是中间隔着一道宽宽的通道。

而大大此刻也不在家，她和我父亲一起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正在朝鲜。马上就过冬天了，妈妈很少回家，她天天在市内上班，复旦在郊区，交通不便。所以这段日子我跟保姆妈妈相依为命，我放学回家，她都在村口等我，远远便看见她胖胖的身影向我招手。

那是一段十分开心的日子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。天天早晨一个熨斗充饥，中午是一碗蛋炒饭。对门的同学吴小吉每天天亮就来叫我上学，她来时，我总是还没起床。我们背着书包急急地出门，急急地在国权路上奔跑，踩着冻硬的煤屑地奔跑跑到嘉陵村，学校就在村内。因为太早，总是在外面等开门——此刻正读到《相辉》182页，眼前突然看见小学的校舍，那房外一整排长廊，熟悉得令我心痛。

徐汇村门口第一家是幢很漂亮的大房子。它是一所幼儿园，院内有许多玩耍的设施，我们这些小孩子趁没人时会跨进去疯玩一场。我尤其喜欢站在那条长长的会前后摇动的铁座椅上，肆意摇晃，好像火车开动一样。我更喜欢跳到围墙外，从村前跑到村后。那时的我，顽皮得像野孩子一般。

之后，又隔几年，我回到复旦念书。那时，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我已经失去健康的双腿，最终我爱我的父亲已经去到另一个世界。我开

始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在燕园的小桥流水边，我天天与一位学阿拉伯语的女孩不期而遇。我完全不知道她姓甚名谁，但我们的声浪朗读交叉在一起，她读她的阿拉伯语，我读我的英语。努力求知，是我当时唯一的心愿。

这时，庐山村已改名第一宿舍，那里，我找到我又一个家：全增嘏胡文淑的家。儿时，全伯伯是我家的紧邻，现在有了胡阿姨，后者的性格是如此大气豪放，令我如感受到父亲的气息。

在他们家中，从没有外人之感。此后，看到、经历那么多的世态炎凉，更增加我对他们的怀念。

胡阿姨带我上父亲的朋友吴剑岚教授家去看腿。其实经历了那么多的病的磨难，我早已对痊愈不抱希望，但看胡阿姨那么热心，剑岚伯又热情相邀，我当然不能拂他们的意。剑岚伯的家就在庐山村对面，我们以前住过的徐汇村，现在改称第二宿舍。剑岚伯独自在家，家里简单得很，看完腿病还要留我们吃饭。胡阿姨见他家方桌上只有一盘高高堆起的菜，立刻拉着我去，一边说，回家吃饭去。与胡阿姨家的温暖相比，剑岚伯的家显得清静许多。

有一回我穿着头一天洗好还未干透的裤子去胡阿姨家，没想到被门口伸出的树枝钩破一个大口子，害得我好狼狈。进到家里，立刻脱下裤子缝补。那时候，衣服上打补丁司空见惯，我根本没放在心上。没想到第二天胡阿姨上学校来找我，把一包东西塞到我手中：“今天上午到上海（那时把城里都叫上海）去，给你买了一块布料，可以做两条裤子，你拿回去找人做一做。”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说完就走了。我愣在村内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胡阿姨高高胖胖，却心细如发。此刻，她把对父亲的情谊，倾注在我的身上。在他们家的一点一滴，那种由内心发出的关怀，我都幸福地聆受，都永远记在心间。

我与复旦的感情，当然源于我的父亲。在父亲断以五十年的生命中，有十六年是他在复旦度过的；在复旦求学，在复旦任教。就是后来调到市内工作，遇到休息日，只要有空，他也会拉着我像回家一样回复旦去看望老朋友。

读《相辉》，有一节写到复旦的壁报，标题是这样的：“壁报：曾经‘风花雪月’，更有‘刀光剑影’”。这令我想起父亲的散文《红烛》，此文就是先

在学生壁报《文艺垦地》第一期刊载的。那是1941年1月，在复旦内迁的重庆黄桷树校区。父亲的许多学生告诉我此事，因为他们喜欢父亲的这篇小文。然《红烛》在教务办公楼墙上只贴出一天，次晨便被特务学生剪走。当时，生性豪爽、爱打抱不平的父亲好友马宗融教授，为此事极为愤怒，还去责问学校训导处。此文后来多次收入父亲的散文集，还有以“红烛”为题的散文集出版。

在父亲的相册中，有一张相对较大的照片，摄于1947年夏天，是父亲与复旦缪司社成员合影，背景的房屋上，清晰可见“南轩”两字。

在《相辉》一书中，我见到“南轩”的全貌。原来它曾经在燕园内，曾被称为“小红楼”。可惜，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。但照片定格了这段历史。

“缪司社”是一个由地下党领导的包括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戏剧等艺术门类的综合性的学生文艺团体。父亲当年被学生请作该团体的指导老师。2005年，“缪司社”的头领，当年复旦学生自治会的会长程极明先生，给我寄来一本《缪司社友回忆录》，信里这样写道：“现寄上我们1947级新闻系同学们的回忆录，我们缪司社的指导老师是靳以先生，所以我把此书送给你，使你了解我们这批32名同学的历史情况。估计你会感到兴趣。”

“回忆录”中还读到许多我以往不知的父亲的事，比如：“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起来以后，党总支又相继推动组织了教授会，由张志让、陈望道、章靳以三先生负责。”又如：“……我当时出露头面地工作，晚上住在宿舍里很不安全，上海又没有家，我是‘党团’的成员，而我们‘党团’每晚要碰头，汇集情况，研究工作。章靳以教授知道我的难处，就把他在庐山村的一幢两层楼的宿舍给我用，他也向当时他家阿姨宋妈交代，一切由程极明使用。宋妈晚上住在她丈夫的传达室里。因此，章先生的家，就成了我们‘党团’彻夜工作的地方。”

……

一张张的照片，一篇篇的回忆，记录了这些学生的青春灿烂。相辉堂前绿草如茵，学子如梭。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、李登辉若在在天有灵，当含笑九泉！

2020/8/8



风云儿女（油画）殷雄

## 上师大六教四楼的办公室

——纪念陶本一校长

陈晔

为什么不去看看上师大的教室，于是就向路旁的一栋教学楼走去。

那栋楼就是第六教学楼，是当时上师大徐汇校区最新建造的一栋教学楼，整洁干净的室内装饰，让我为之一振。我们先在一楼的前楼快步走了一圈，看到有几位学生在教室里看书，又到六教的后楼，看到外国留学生在小教室学习，教师办公室则都紧闭着。然后我们向上走，在走近四楼中间一间办公室时，听到有人讲话，两间办公室半开着，一位头发略带花白、相貌堂堂、气度非凡的长者，戴着银边眼镜，穿着整洁的衬衫，非常斯文地坐在沙发上，与对面凳子上的中年人交谈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我敲了敲门。那位长者转过头，慈祥地对我们说：“请进，有什么事？”

我向他说明来意，他站起来，示意我们进入办公室，然后他有条不紊地讲了一些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：“上师大的老师教书育人认真负责，上师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全上海排名第三，上师大校园

环境很好，是全市有名的花园学校，在上师大学习与在复旦交大同样能成才。”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接着他又对我说：“进入大学之后，要更加自立，更多事情要独立完成，不需要父母老是陪着。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来找我。”尔后我才知道这位可亲的长者就是陶校长，当时已经退休了。

走出六教之后，我们改变直接回家的打算，穿过桂林路，去了学校东部。可能是陶校长的一席话，再加上东部校园原本就比西部美丽，跨过桥，进入东部后，我仿佛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，大草坪，小桥流水，亭台楼阁，林间石凳，应有尽有。由于交谈时，陶校长只说姓陶，并没有介绍自己，在逛东部校园时，我们不断猜测他的身份。爸爸认为从他的谈吐气质看，一定出过国留过学，从他行为举止和神态推测，他应该是学校领导。我和妈妈也是有类似感觉，妈妈还补充了一句：“他演大学校长，不用化妆。”

时间飞逝，这一幕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。现在我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，再回首当年，对陶校长那短短几句话里展现出来的一位教育家的责任心、使命感以及教育理念更有体会，套用现在的专业术语来说，就是“全方位育人”。

除了2002年进校时，他给我很关键的指点外，在我人生中另外几次重要的转折点，他也给我非常重要的指引。2008年读硕士时去韩国学术交流，就是被他鼓励之后才下的决心。在选择博士专业时，他帮我分析利弊，最后建议我报考本校历史系的博士，还帮助我修改简历，很仔细地建议我把表格改为横线。2012年，我博士毕业那年，他已身体不佳，住进华东医院，我去看望过他，见他精神大不如前，已显老态，幽默地称自己“糟老头”，但他依旧十分关心我的近况。

从本科到博士，我在上师大读了整整十年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陶校长总是每



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，陶校长创办的《语文报》，无数学子因之终身受益，其在中学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就，有目共睹。陶校长也是我在上海师范大学求学时期认识的第一位老师——是的，我在上师大认识的第一位老师，竟然是校长！

2002年8月中旬，是我人生中最低谷的时期。那年是最后一次7月高考（今年因疫情高考才推迟至7月），大学招生实行先填报志愿，后进行考试。我那年高考总体发挥还算正常，但因为一本第一志愿是华东师大对外汉语专业，考分高得出奇，又没有填报从专业调剂，就落入“补填志愿”行列。我那年“补填志愿”中的学校均为外地高校，父母不支持我去，但如果不去填报，我将直接落入二本的上师大。那几天我纠结得要命，甚至想过复读，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。父母建议先去上师大校园看看，然后再做决定，同时还可以去附近的桂林公园和康健公园走走，散散心。

我是因为“补填志愿”，才来到上师大，心情可想而知。妈妈回忆起她第一次来上师大时的情景，当时学校停课，高考取消，但外公相信高考总有一天会恢复，就带着她逐一走访沪上的大学，以激发她继续学习的动力，其中有上师大。我们在丹桂园餐厅吃了午饭，看到校内暑期都是施工场地，碎石黄沙堆得一场糊涂，便准备离开。正要走出校门时，我突然想到，来都来了，